

清代西北边疆屯田政策与经济开发^{*}牛海桢¹, 李晓英²

(1. 甘肃联合大学 文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2.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 福建厦门 361005)

[摘 要] 清朝重新统一新疆后, 为了给驻守官兵提供足够的兵粮兵饷, 清王朝在该地区实行了兵屯、户屯、回屯、遣屯和旗屯等多种类型的屯田政策。这些屯田政策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 但是屯田政策实行过程中的重北轻南倾向, 也对西北边疆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关键词] 清代; 西北边疆; 屯田; 经济开发

[中图分类号] K249.3;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304(2005)04-0010-04

Tuntian Poli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North-Western Frontiers in Qing Dynasty

NIU Hai-zhen¹, LI Xiao-ying²

(1.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Gansu United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00, China;

2. Department of History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reunification of Xinjiang by Qing Dynasty, in order to have a sufficient supply for the stationed army, Qing Dynasty conducted various station policies of soldier station, Household station, Hui station, Transfer station and Qi station. These station policies achieved great success, pushing forwar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border regions, but brought bad effect to the borde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ecause of focusing their attention to the North and lessening their attention to the South,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ation policies.

Key words: Qing Dynasty; North-Western frontiers; tunt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清朝重新统一新疆后, 由于经过长期战争的破坏, 西北边疆地区地旷民稀、疮痍满目。清王朝要在西北边疆地区巩固自己的统治, 首先就是需要有足够的兵粮、兵饷作为经济保障。于是, 清朝在西北边疆实行了由内地资助边疆的协饷制度。但是, 单纯依靠内地的供给无法完全满足西北边疆社会的需要。为此, 清王朝在西北边疆实行了旨在“屯垦开发、以边养边”的开发经营方针, 在西北边疆地区大举屯田。清代西北边疆屯田按从事者的身份不同, 可分为兵屯、户屯、回屯、遣屯和旗屯几种类型。本文拟对清王朝在西北边疆地区实行的屯田政策进行探讨。

一、兵屯

兵屯是清代新疆屯垦的重要形式之一, 主要指

以绿营兵行垦, 始于康熙年间。从康熙五十四年开始, 就在西北的凉州镇番以西至巴里坤、吐鲁番一带实行屯田^[1]。乾隆重新统一西北边疆后, 开始大举兵屯, 兵屯的设置及管理制度以伊犁兵屯为例可知:“乾隆二十五年, 办事大臣阿桂奉旨自阿克苏带绿营兵一百名始至伊犁屯田。是年又奏调绿营兵九百名, 共计一千名, 俟到齐后即令全行垦种。至三十四年, 陆续由内地增调屯田兵至二千五百名, 五年更替, 以五百名差操, 二千名屯种。”^[2]早期的伊犁屯兵, 并未携眷定居, 带有临时性质。乾隆四十三年起, 清廷关于新疆之兵屯政策显然出于更深远的考虑而有所发展。是年准将军伊勒图奏“准所调屯兵, 改为携眷, 定额三千名, 以五百名差操, 二千五百名屯种, 分二十五屯”。^[3]但实数不等, 一般不少于十五屯。定制为每屯兵百名, 每名种地二

* [收稿日期] 2005-05-27

[作者简介] 牛海桢(1970-), 男, 甘肃甘谷人, 甘肃联合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民族学、历史学教学的研究; 李晓英(1970-), 女, 河北承德人,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 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史研究。

注: ^[1] 参见松筠《西陲总统事略》卷 7《兵屯》。

^[2] 参见《清高宗实录》卷 642 及卷 1056。

十亩。为保持地力及收获量,所有屯地,均实行轮歇耕作。兵屯所用农具畜力由政府供给,种植种类比例均有规定。如乌鲁木齐屯兵,每名种地二十一亩,“内小麦十四亩,青稞二亩,粟谷四亩,胡麻一亩”,籽种量按规定为:“小麦、青稞每亩用籽种一斗,粟谷每亩用籽种一升五合”。关于农具的规定是“原定兵二名合给农具一副,马二匹”,后改为“每兵三名给农具一副,马二匹。马匹每年三分报销,牛一分五厘报销”¹。至于屯兵所使用农具件额、重量也有详细的规定,屯垦初铁制农具多运自关内,后随着新疆矿业的发展,多由本地打制。清廷关于新疆兵屯定有奖罚章程。“新疆军屯分数,人获细粮十五石至十八石,官议叙,兵丁赏一月盐菜银,二十五石倍之,十二石以上,功过半,不及,官议处。兵重责留屯,次年收足予复。乌鲁木齐但获粮十一石以上即叙赏。塔勒纳沁尤硇瘠,赏罚递降杀之”^④。按当时规定,乌鲁木齐、乌苏、精河、巴里坤各屯营,收十二至十五石以上者,准功过相抵,毋庸置议。不及十二石至十五石者,照伊犁不及十五石之例议,处兼营官罚俸一年,统辖官罚俸六个月,不及十石至十三石者,兼营官降一级调用,统辖官降一级留任的处分^[1]。

兵屯是我国历代中央王朝巩固边防的一项重要措施,至今为人们所称道,普遍认为这是一项无可争议的利国措施。但是,它对边军战斗力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却少有人注意。薛宗正先生认为:“它虽然在减轻边疆各族人民的负担,增加收入方面确有显效,但却疲惫了驻军,降低其社会地位,使军人这一荣誉性职业几乎与遣犯地位相等,使一般良民视投军为畏途,从而损害了边军的战斗力,这正是我国兵屯制度的痼疾之一。”^[2]我们可以看出,兵屯的弊端较多,它适于战争时期,而在和平时的兵屯,政府负担很重,屯兵的生产积极性不高,收获不理想,这也使边疆驻军的战斗力大受影响。相比之下,民屯和回屯有劳动积极性,生产能发展,国家征收田赋有保证。因此,由兵屯向民屯的转变就成为必然。

二、民屯

民屯是清代新疆屯垦中影响深远的一种形式,其用意与“移民实塞下”的传统政策有关,相比兵屯

而言,更具有劳动的积极性。乾隆二十六年,清政府鉴于乌鲁木齐等地方粮食丰收,但由于人口稀少,销售渠道不畅,决定减少屯田兵丁,但又虑及垦熟地亩,荒废可惜,遂决定“令腹地愿往无业游民,量为迁移,则垦辟愈广,内地既可稍减食指之繁,而该处量石,亦不致沉积,自属一举两得”¹。

自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始,最初拨派新疆者主要是就近征发的甘州民户,是年正月一起就有“张掖、东乐、山丹种地民人二百户,男妇大小七百七十口”赴屯乌鲁木齐^(四),以后将甘州民户逐步扩大到木垒、奇台、西吉尔马泰、济木萨、古城各地。至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九月,张掖、山丹、东乐、抚彝厅累计拨赴乌鲁木齐所属屯户人数多达六千一百九十四人。为了尽量多地招募内地民户西移出关屯种,清廷及西北地方当局实行了一定的优惠政策。乾隆二十七年,经陕甘总督杨应琚奏准,“招募内地无业穷民,官为咨送”。后又规定,内地民户到屯地后,“每户拨给三十亩,力能多种者亦听民便,赏给农具一副,籽种小麦八斗,粟谷一斗、青稞三斗外,借给建房银二两,马一匹,作价银八两”,所借房、马、价银,待生计充裕后完交。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后,清廷又准原移屯户民所借房、马、价银以升科之年为始,分作三年完交,地亩升科纳粮及时者有奖。在上述政策的吸引下,乾嘉年间关内穷民纷纷西移出关认屯,出现了内地居民纷纷出关屯垦的热潮,都应是此项户屯政策认真实施的结果。

清代新疆的民屯居民的来源实际上十分复杂,并非只是自内地招募一途。乾隆年间纪昀所记载:“乌鲁木齐之民凡五种:由内地募往耕种及自塞外认垦者谓之‘民户’,因商贾而认垦者谓之‘商户’,由军士子弟认垦者谓之‘兵户’,原拟边外为民者谓之‘安插户’;发往种地为奴,当差年满为民者,谓之‘遣户’;各以户头分约统之。”(纪昀《乌鲁木齐杂记》)综合《钦定皇舆西域图志》、《三州辑略》、《塔尔巴哈台事宜》、《乌鲁木齐事宜》诸书所记,乾嘉间北路户屯之发展大势实可见于以下统计: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北路户屯垦地为29万余亩。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扩大为110万余亩。

¹ 参见《乌鲁木齐政略·屯田》。

^④ 参见《清史稿》卷120《食货一》。

^(四) 参见《三州辑略·沿革门》。

三、回屯

回屯是指清代使用维吾尔族民众屯田。天山以北在准噶尔之时,主要是以畜牧业为主的游牧经济,17世纪巴图尔珲台吉开始利用掳掠来的南疆维吾尔族百姓从事农业生产。康熙末年,清军进兵西北的过程中,哈密一带的维吾尔族率先投降清朝。当时哈密为清军同准噶尔作战的前进基地,因此最先在这里组织维吾尔族民众屯田。康熙五十七年九月,侍郎海涛疏称:“回子扎萨克额敏所种之塔尔那沁地方,种过籽粒所余青稞,各令本处修理旧仓,加谨收贮看守,已行文巡抚噶什图、绰奇,今充兵粮。”¹以原有回地所获备仓充作兵粮,使民地转入屯地系统,这是清代早期回屯的一种形式。

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乾隆谕军机大臣:“伊犁驻兵屯田,关系甚重,亦宜预为筹画,从前伊犁地亩,皆回人耕种。今俟回城平定,即将回人酌量迁移,与绿旗兵参杂”^④。后哈密之蔡巴什湖及吐鲁番等地,虽形式稍异,但以所获近半供军粮则与其它地方大体一致。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办事大臣阿桂“自阿克苏带领回子三百名至伊犁,分拨垦种。自二十七年至三十二年,陆继由乌什、叶尔羌、和阗、哈密、吐鲁番等处增调回子共六千户,垦种地亩”。乾隆末年以“生齿日繁”,增拨四屯地亩,增交粮至十余万石。伊犁回屯就性质来说属于军事系统管辖下的地区性移民,维吾尔族民众并非出于自愿。但迁移设屯之始,官给口粮、籽种、农具、牲畜,基本生活及生产条件均有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维吾尔族民众前往。

回屯的具体管理者由维吾尔本族人担任。乾隆二十五年,乾隆谕军机大臣:“额敏和卓系回部望族,应同将军大臣等,管束屯田兵丁,俟耕作娴习,主客相安,再回吐鲁番”^④,命令额敏和卓管辖伊犁回屯。额敏之后,“管辖六千回户分屯种地之始,系阿奇木伯克茂萨。茂萨者,吐鲁番郡王额敏和卓之次子”^④。在整个回屯管理系统中,时共设大小屯田伯克八十一员,分管刑名钱粮及水利诸务。回屯所交粮食,主要供清军驻防官兵支放。清代的回屯,主要分布在哈密、吐鲁番、伊犁等地。仅伊犁一地,至嘉庆年共有三万四千人^[3],对于屯田

各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遣屯

遣屯即将内地罪犯发遣西北边疆地区屯田实边,这种形式又称“犯屯”。我国历史上汉、唐、元、明诸王朝都曾经实行过。清康熙年间,承袭前代旧制度在西北边疆民族地区实行了遣屯,从而成为清代西北屯田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康熙五十四年,在平定准噶尔的过程当中,漠北的喀尔喀、科布多军营兴办屯田,一部分遣犯被发往北路军营为奴役使。据王希隆先生考证,康熙年间北路设立犯屯的地方主要有:科布多、乌兰固木、茂岱察罕瘦尔、鄂尔昆、扎克拜达里克等地^[4]。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配合新疆兴垦屯田的需要,清政府决定将内地军流人犯改发新疆。“军机大臣等议奏,御史刘宗魏奏,请嗣后盗贼、抢夺、挖坟应拟军流人犯,不分有无妻室,概发巴里坤,于新辟夷疆并安西回目扎萨克公额敏和卓部落迁空沙地等处,指一屯垦地亩,另名圈卡,令其耕种。目前已配到各处军流等犯,除年久安静有业者照常安插外,无业少壮,曾有过犯者,一并改发种地,交驻防将军管辖。应如所请,并将此外情罪重大各军流犯一体办理,从之。”¹乾隆皇帝采纳了刘宗魏的建议,多次就军流人犯改发新疆一事颁发上谕,阐明道理,敦促实行。从刘宗魏的建议可看出,清政府将内地军流人犯改发遣送新疆,除了对犯罪者施以较重惩罚,防止其继续扰乱内地社会秩序,巩固封建统治等目的外,还明确带有充实新疆人口,增加农业人手的用意。从这个意义上说,军流人犯改发遣送新疆,从一开始便与新疆农业开发的需要相联系,是一种特殊身份的农业移民。

遣犯在屯田处并非独立安置屯田,而是夹于屯田兵丁当中,“俱随屯田兵耕作”,期满方释为民。遣犯的管理是十分严格的,一般是“某某犯给某营兵丁,令该管官记档。至换班时,交接班兵为奴或撤回及调他处,亦另拨给附近种地兵,随同力作”。实行严格的军事管理制度。根据王希隆先生的研究,乾嘉之际至道光间,对于新疆遣犯屯种的地亩,各地并不一致,一般在十二至二十二亩之间。王先

¹ 参见《清圣祖实录》卷281,康熙五十七年九月己亥。

^④ 参见《清高宗实录》卷560,乾隆二十三年四月己巳。

^④ 参见松均《西陲总统事略》卷7《回屯》。

生认为：承种十二亩地的遣犯，其劳动应为两部分，即既在自己份地上劳动，又在屯兵份地上助力耕作。而承种二十至二十二亩地的遣犯，则完全在自己份地上劳作^①。遣犯农具牲畜由官供给，每年贡成纳粮亦有成数，大致较屯兵减半。遣犯多为单身，但清政府曾规定：“发遣新疆人犯，俱令金带妻子”^②。所有在屯遣犯，由官府发给口粮及衣履盐菜银两。由于有一定的生活保障，遣犯家眷也能得到衣食，加上另有赏功减刑的规定，遣犯虽在不自由的环境下劳作，但也努力耕作，收成也相当可观，成为清朝西北边疆的重要劳动力。

五、旗屯

旗屯主要指驻防伊犁的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诸旗营屯田。锡伯、索伦诸营于乾隆二十九、三十年间陆续由盛京、黑龙江、张家口各地携眷调赴伊犁，各设领队大臣及正副总管统辖。锡伯营八旗驻伊犁河南，索伦驻河北，察哈尔驻博乐一带，额鲁特营左翼移自热河，驻特克斯以西中俄边界诸卡伦，右翼为准噶尔遗属，驻登努剪、阿尔哈勒等处卡伦。据《西陲总统事略》记：“锡伯八旗八佐领分八屯”，“索伦八旗八佐领分左右两翼屯种”，“察哈尔营八旗亦分左手两翼屯田”，“额鲁特上三旗六佐领屯田四处”，“下五旗十四佐领屯田十六处”，按清文献记载：“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四营除照例支給饷银外，所有口粮局系自耕自食”^③。嘉庆九年松筠奏中有“查锡伯营，向无官给口粮、米面，均系自耕自食，现在生计有资，迥无两满营拮据之况”^④。这充分反映了屯田自食的情形。

满洲旗人在清代属于统治民族，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享有特权，新疆设屯之初并没有实行旗屯。乾隆时期，驻扎边疆的满蒙旗营，多携带眷属子弟，尤其是满营及其随营亲属，仅靠国家钱粮，实不足以赡养。因此旗营进驻伊犁之初，乾隆皇帝即谓：“伊犁田土肥润，如数多人耕作，莫若令满洲官兵分种，既保勤于力农，而于养瞻家，饲养马匹，均属有

益”^⑤。当时，将军明瑞曾设想以伊犁附近两百里以内划为旗地进行屯田，但几经周折，加上旗人反对，最终未能成功。清中叶后，旗人生齿日繁，闲丁日多，实行屯田，自耕自食又被提上议事日程。“嘉庆七年，将军松筠相度地形，亲为履勘，奏明于惠远城东，伊犁河口北岸，漫大渠一道，逶迤数十里，引用河水灌田，择可耕善地，分授惠远城官兵耕种，而前此绿营裁撤之屯授惠宁城官兵，均令闲散余丁代耕并雇人佃种，永为世业……此又旗屯之所由始也。”^⑥故伊犁旗屯实始于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主持者为将军松筠。

六、清代西北边疆屯田政策所起的作用

（一）清朝在新疆的屯田基本上保证了兵粮的供应。乾隆年间福康安奏：“今即以乌鲁木齐、玛纳斯、济木萨三处而论，每岁屯兵口粮约需三万余石，就去岁收获九万有余，是一年所收，已有屯兵三年之食。况乌鲁木齐所属，现存仓贮，截止四十八年年底止，共有京斗粮八十余万石。而伊犁四十八年奏销册报亦存贮各色粮五十四万余石，均可无虞缺乏。”^⑦这有效地保证了军粮供应。

（二）屯田政策促进了西北边疆地区商业经济的发展。在屯田发展的同时，很多商人和手艺人也纷纷到新疆地区谋生。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清朝政府即“晓示商民有愿注音即给以印照”^⑧，鼓励人们到新疆贸易。据乾隆中后期的记载，像巴里坤，“城关内外烟户铺面比栉而居商贸毕集，晋民尤多”。有的商人还参加屯田。原来只是厄鲁特蒙古牧场的乌鲁木齐，城内“字号店铺鳞次栉比，市衡宽广，人民辐凑，茶寮酒肆，优伶歌童、工艺技巧之人，无一不备”^⑨，成为天山北路的最为富庶的地方。伊犁地区、哈密、吐鲁番、古城、昌吉，以及喀什噶尔等南路各城，也都有内地商民经商。

（三）屯田政策促进了新疆人口的增加。大批的民户、遣犯自关内来到边疆参与屯田和经营各种产业，使西北边疆的人口大大增加。（下转第16页）

^① 参见《清高宗实录》（卷556、卷656、卷780）。

^② 参见松筠《钦定新疆志略》卷8《库储》。

^③ 参见松筠《西陲总统事略》卷7《旗屯》。

^④ 参见祁韵士《西陲要略》卷3《旗屯水利》。

^⑤ 参见《三州辑略·屯田门》。

^⑥ 参见《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16，乾隆二十七年三月甲午。

^⑦ 参见椿园《西域闻见录》卷1《新疆记略上》。

产。因此,发展较大规模的畜牧业经济组织,特别是加工、销售组织是降低牧民市场运行机制交易费用的重要途径。新疆今后畜牧业发展的主要目标应突出发展奶业、优质细羊毛产业化经营,加快发展牛、羊肉产业化经营。

(三) 建立优质牧草品种生产基地

“草业振兴,种子先行”,优质牧草种子是发展草业生产的重要条件之一,是振兴草业的基础。新疆的和田大叶苜蓿是全国性的良种,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2002 年每公斤种子售价达到了 50 元。要扩大这一优势品种,可以考虑制定规划,加大投入力度,争取把和田建成全国性规模化的苜蓿种子生产基地。同时,在牧草业相对集中及对牧草业需求大的天山北坡的昌吉州建立一个牧草种子基地。一方面满足本区发展需要,另一方面真正把苜蓿产业做成全国性的大产业。

(四) 加强天然草地的保护和基本草场建设

主要通过围栏划区轮牧和封育,做好蝗虫、鼠害的防治措施,建立禁止开垦区、加强进入草原开展旅游和经营活动的规范管理,对草场进行保护;实行退牧还草,修复退化草地,建设人工草地,改全年放牧为半年舍饲圈养;研究牧区环境容量,进行

生态搬迁、建立草畜平衡制度。

(五) 开展绿色营销,引导居民消费

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已有很大提高,消费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居民越来越倾向于消费营养、安全、无污染的绿色食品和购买环保企业生产的产品。新疆地理位置偏僻,草原分布在偏远山区,草原空气、水质、土壤保持着良好的洁静水平,受化肥农药的污染程度相对较轻,草原上气候干旱、光照充足,土壤营养丰富,气候多样,畜产品资源十分丰富。这样的生态地理资源环境决定了草原地区可以生产种类繁多的无污染、优质、安全的绿色产品,通过开展绿色营销,解决我区农畜产品卖难问题,同时增强人们的环保观念,实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 许鹏. 新疆草地资源及其利用[M]. 乌鲁木齐: 新疆科技卫生出版社, 1993.
- [2] 崔恒心. 新疆牧民定居与饲料地建设方案研究[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5.
- [3] 刘俊浩, 王志君. 草地产权、生产方式与资源保护[J]. 农村经济, 2005, (8).
- [4] 任治. 论草畜分权经营[J]. 四川畜牧兽医, 2003, (3).

(责任编辑: 吴凌霄)

(上接第 13 页) 据学者研究, 到乾隆四十年(公元 1775 年)为止, 乌鲁木齐、宜禾、昌吉、伊犁、阜康、奇台、玛纳斯等七个地区, 关内移来参加民屯的人数已有 72, 023 人^[5]。上述民户有的一开始就举家迁移而来, 但也有一些是光身单丁先到新疆, 等以后稍有积聚, 才回内地搬迁家口。乾隆四十二年(公元 1777 年), 在乌鲁木齐有张锦等 1, 540 人, 在政府资助下陆续回乡“搬取眷口”¹, 在社会生产力极为落后、农业经济为主的西北边疆地区, 人口的增加意味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也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发展的后劲。

由于历史的原因, 清朝在西北边疆实行了重北轻南的经济开发政策, 这对南疆地区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但是我们必须看到, 清朝在西北边疆实行的屯田促进了经济的开发和社会的发展, 对后世影响深远, 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消极的防范隔离和重北轻南的经济开发政策, 不可能给南疆乃至全疆带来长久的安定。随着各方面形势的变化, 清朝

廷开始从原来的重北轻南转向南北兼顾, 开始有意识地经营和开发南疆。到道光二十四年(公元 1844 年), 南疆各城全面开始垦田, 将垦地合理分配给维吾尔人和招徕汉族民户, 各族民众共同开发, 彼此往来, 有利于增进相互间的了解与友好相处。虽然在当时的南疆, 这种民族之间的了解和联系还很有限, 但相对于以往时代, 南疆开发毕竟有了明显的发展, 这是值得重视和肯定的。

[参 考 文 献]

- [1] 王希隆. 清代西北屯田研究[M].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0. 4-128.
- [2] 薛宗正. 安西与北庭[M].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5. 384.
- [3] 曾问吾. 中国经营西域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6. 268.
- [4] 王希隆. 清代西北的犯屯[J]. 西北民族研究, 1988, (2).
- [5] 徐伯夫. 清代前期新疆地区的民屯[J]. 中国史研究, 1985, (2).

(责任编辑: 云 飞)

¹ 《清高宗实录》卷 1025, 乾隆四十二年正月甲午。